

论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 乡土志的时代特色

邹涛 卢华语

[摘要]西南地区虽地处偏远,但乡土志编撰仍不可能脱离时代前进的步伐,故清至民国时期本区乡土志也富有鲜明时代特色:如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追赶世界发展进程的近代化内容丰富;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等。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对研究近代西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和近代化进程非常重要,颇具史料价值。

[关键词]清至民国时期;西南地区;乡土志;时代特色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1—0216—06

作者简介:邹涛(1978—),女,四川达州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历史经济地理;卢华语(1950—),女,重庆大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历史经济地理。重庆 400075

乡土志是清政府为培养国民爱国精神、巩固国家统治于1905年倡导并开始编撰的新型初等小学教材,其内容丰富全面,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由于乡土志产生的历史时期特殊,编写和运用的时段主要在中国动荡变化的清末至民国时期,故深深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时势既殊,情事各别”^{[1]〔序〕},相对偏远的西南地区编撰乡土志凡109种,且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迄今为止,学界未见专论当时西南乡土志时代特色的成果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期抛砖引玉。

一、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鲜明

这是清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的一个重要时代特色。岌岌可危的晚清政府面对列强的肆意侵略,为培养国民的爱乡爱国情怀,实行了全方位的教育改革,其中就包括编写和使用初等小学教材“乡土志”。从乡土志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清政府的改革目的不难看出,乡土志必定带有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特色,这在当时本区乡土志的“序”和“跋”中表现尤其突出。当时本区乡土志有“序”者45种,附“跋”者仅8种。在数量较多的编有“序”的乡土志中,几乎都会论及培养国民的爱乡爱国情感。如《丹棱县乡土志》“弁言”云:“方今强邻逼处,虎视鹰瞵,非亟图自强不能国于地球之上”^{[2]〔弁言〕},道出当时国人面对列强觊觎的强烈危机感。而《南部县乡土志叙》呼吁:“欲人人

爱国,必先使自爱其乡”;号召乡土教育应“完全人格、巩固邦基、消弭外患,犹朝潮夕汐之不可思议。”^{[3]〔P.327〕}很明显,该乡土志不仅反映了“消弭外患”的御辱雪耻时局诉求,更体现了培养国民的爱国之心的宗旨,是那个时代民族危机异常严峻的真实写照。民族危机引发国人强烈的爱乡爱国情感,如《路南县乡土志辑要》载:“当此外侮日亟之时,增强爱乡之心也,就是爱国心的初步。”^{[4]〔乡土历史大纲P.2〕}《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编辑大意”直指:“是编为引人之乡土观念而编”^{[5]〔P.2〕},而《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也直言:“盖将有来者焉,爱国爱乡之观念,或赖以不息乎。”^{[6]〔序言〕}当时本区大多数乡土志序言都会点明编撰乡土志的目的即为培养和延续国民“爱国爱乡之观念”,这是那个时代中国最迫切、最真实的需要。

乡土志的“跋”也是对御辱雪耻、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观念直抒胸臆的部分。当时本区写有“跋”的乡土志甚少,仅有《路南县乡土志草本》^[7]、《路南县乡土志辑要》^[4]、《中江县乡土志》^[8]、《大邑县乡土志》^[9]、《灌县乡土志》^[10]、《巴塘盐井乡土志》^[6]、《新都韵言》^[11]、《巫山县乡土志》^[12]等8种。但在这为数不多的乡土志“跋”中,也透露出作者御辱雪耻的真切期望和爱乡爱国的浓郁情感。如《巫山县乡土志》“跋词”云:“何日遂得红旭升殄,消瘴共瘳,我才愧马班聊

舒愤懑气”^[12]跋,洗雪耻辱、期待光明的呼声实为时代之强音。《中江县乡土志》“跋”曰“欲自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也,其可得乎,所愿有志之士急起直追,以开通为抵制,将见英华富于一乡,名誉盛于一国,而影响亦遂及于天下,富强之基宁不在此耶。”^[8] [P.282] 呼吁有志有才之士奋起直追,挽救民族危亡,应对商战,使中国能够“自存于竞争剧烈之世界”。这其中包含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浓烈的爱国情感。

另,在一些乡土志的行文过程中论及某方面内容时也会凸显此鲜明观念。如《腾越乡土志》“商务”部分的论述处处都有“欲挽回权利,安可不谋补救之法乎”^[13]的类似叹息,显示作者对该县贸易状况恶化的担忧,表现出浓浓的爱乡情怀。《乐至县乡土志》在介绍“小学教授法”时不惜笔墨叙述“漂流在外的老乡见面必谈家乡之事”的实例后,指出“小学校之教爱国心,专就其爱乡土心以推至于国家。”^[14] [P.3] 这也表达了该乡土志作者深深的爱乡之情和强烈的爱国观念。

二、放眼世界、对外开放的进步思想突出

时代的飞速发展推动着当时国人思想观念的进步,对本国和自己家乡的认识与对世界的认识逐渐紧密结合起来,不再局限于狭隘的本土意识,不再固步自封、保守自闭,而是以更广阔、更先进的世界眼光看待国家的发展,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姿态接受先进文化,这种因时代更替带来的进步思想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随处可见。如《蒲江乡土历史读本》的“编辑宗旨”就有一条“篇中言本境,间及中外国度民质,俾小学读之,略具世界眼光。”^[15] 此言直截了当点明,该书所撰内容增添了国外的知识信息。《元江乡土韵言》云“今之士大夫亦当纵谈五洲万国矣”^[16],作者提倡国人应关注“五洲万国”的国际形势。《中江县乡土志》“跋”曰“间当博览译书,而知西人游历之所及……”^[8] [P.282] 作者强调通过翻译、博览西方著作,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而求得本国的发展,并以“优胜劣败”观点提倡将国家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环境之中,反映了当时文人官绅已具备放眼世界的意识,这是时代发展的召唤。

近代,各种外国商品涌入中国市场,大量白银外流致使国人认识到“商战”对维护国家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重要性,本区乡土志亦同样有记载。如《金堂县乡土志》“商务”部分开篇即云:“今日之天下,一商战之天下也。”并在分析了外国列强致富强大的原因和我国遭受经济侵略的事实

后倡导“惟有推广商务,以与彼族互市,尚可挽回利权,不可谓非转贫为富、转弱为强之机也。”且根据“金堂为蜀西小邑,僻处一隅”的实际状况,以开阔的眼光提出金堂县对外贸易的途径^[17] [P.75],可谓商业思想丰富、通商意识强烈,思想进步、眼界开阔。《丹棱县乡土志》“地理绪论”言“方今朝廷励精图治,锐意富强,学校之科,先重地理,地理志学,先从乡土。凡欲民知本境之孰利孰弊,而后知外国之孰盛孰衰,相与竞争,富强也。”^[2] [地理卷] 此表明作者希望通过乡土地理知识的传授,使国民了解本地的优势和不足,进一步掌握外国列强的发展局势,这样才能与之竞争而达到富强中国的目的,映射出那个时代国人放眼世界的强烈意识。

三、学习先进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管理经验的近代化内容丰富

清末,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认真思考救亡图存之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风靡一时。故清末、民国时期西南地区的乡土志因时代需要,非常注重对诸如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交通通讯、文化教育等内容的编撰。

如政治管理,当时本区乡土志中在政治管理方面最能反映本区近代化特色的是行政机构的变化和警察制度的设置。就行政机构的变化而言,《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18]、《云县乡土教材》^[19]、《平彝地志资料表册》^[20]等的编写内容尤其突出。《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第十二课记“光绪二十七年典归闾县,现改为学堂矣。”^[18] [P.8] 《云县乡土教材》第十二课在叙述了该县从明代到民国时期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过程后云“民国二年,易州称县,改知州为县知事,吏目为县佐(或称分治员)。十七年又改县公署称县政府,知事称县长。二十一年废除猛麻县佐,二十八年,裁民、财、建、教四局归并县府,设五科(三)办事。”^[19] [P.30-31] 《平彝地志资料表册》“十五:政治”则直接以《云南省平彝县官署表》(民国十二年)^[20]呈现了该县各行政机关的所在地、长官名称、职员数、书记数、警察丁役人数、一年度入出经费数等信息,且其中的检查局、商税局、警察事务所、县议会、劝学所、实业所等都是近代中国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而设置的行政机构。不管是牟定县的“典史署”被改为“学堂”还是云县的“州”改称“县”及其官员“知州”、“吏目”改为“县知事”、“县佐”,抑或是平彝县设立的检查局、商税局等政府机构,都是当时西南地区乡土志在行政机构设置方面学习西方先进政治

管理经验的时代特色之表现。

另就警察制度的设置而言,当时本区乡土志中亦有颇多记载。如《江津县乡土志》载“光绪三十一年,知县龚宝琅(湖北监生)奉文将保津营改办警察。”^{[21] [P.13]}《晋宁乡土志稿》记“三街關圣宫设警察局”^[22],都记载了当时本区警察制度的创建情况。此外,《江北厅乡土志》^[23]、《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18]、《册亨县乡土志略》^[24]、《昆明县地志资料》^[25]等都从人员配置、武器装备、日常工作、重点事务等方面介绍本地的警察制度建设概况。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警察制度具有职能独立化、机构专门化、管理法治化等特点,受到当时本区乡土志作者的关注,故此种学习西方先进政治管理经验之举成为乡土志记载的重要内容。

经济管理是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载的另一重要内容,然又以交通通讯和农业经济管理的记载最为突出。在交通通讯方面,贵州地区乡土志的记载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较为系统。如《贵阳乡土地理》第一编“本国地理概要·交通”一项,就有当时交通通讯概况的介绍。该项内容细分成航路、铁道、汽车路、邮务、电信、航空等6个方面,“铁道”内容最为详尽,不仅列《全国铁路一览表》^{[26] [第一编P.18-19]}呈现当时中国铁路的修筑情况,而且还注明“已成铁道全部通车者”和“未成铁道(勘定路线或已兴工或有一部分通车者)”的铁道线名称、起终点、路权、里程等情况;同时还记“如滇越、龙州、南满、安奉皆外人自办者也。”^{[26] [第一编P.19]}。《榕江县乡土教材》“交通”部分就对该地邮政和电政线路有详细记载“榕江邮政辟有邮路五条……电政方面,有电报线三……长途电话,有通三合、都匀,通丙妹、福祿,通黎平等地。县府方面,设有乡镇电话……”^{[27] [第六章]}较为系统地呈现了该县邮政、电政全貌。当时记载贵州省交通通讯情况的乡土志还有《册亨县乡土志略》^[28]、《定番县乡土教材报告》^[29]、《石阡乡土教材辑要》^[30]等。

另,云南省记载交通通讯相关内容的乡土志也比较多。如《路南县乡土教材辑要》地理卷第五节“交通”开篇即云“本县交通分陆路与水路,陆路又分为大路、公路、铁路三种,交通状况正在改进与变迁中。”^{[4] [地理卷P.13]}且附“路南公路、铁道图”。《滇志韵语》以“光绪十二年,设局安电”^{[31] [卷下P.10]}为开端详细介绍了该省的电讯线路概况,又以“近有铁道,简路等零”^{[31] [卷下P.11]}开始介绍当地的铁路建设情况。

又,四川省乡土志对近代交通通讯也有一定

的记载,且信息量大、内容翔实。如《绵竹县乡土志》的一条“例目”载“铁路工程表附租股局,为儿童预计路线里数、价值以启将来同谋公益之举,并使本县出股者知其大概。”^{[32] [P.2]}在正文部分则罗列了该县所修铁路的路线及其地理位置、难易程度、所需经费等情况,甚为详备。《四川乡土常识》“交通”部分首言云“现在川省交通,约分属水道、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电讯六种”^{[33] [P.43]},随后则分别记述六种交通类别的具体建设和发展情况。《泸县乡土地理》“交通”部分还附有质量较高的地图,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电话、电报地图和邮政地图。

前列公路、铁路、航空、邮政、电信等都是交通通讯近代化的产物,而当时本区几乎50%的乡土志都对此有所记载,充分证明清至民国时期西南乡土志体现该时期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近代化特色甚为突出。

农业经济管理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经验的又一项重点内容,同样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多有记载。如《大邑县乡土志》“大邑新政”之“蚕桑”部分,记载了近代大邑县政府面对本地蚕丝业落后于绵州、仁寿等地的情况,采取诸如编辑刊印养蚕技术书籍和订立并实施《蚕桑新法》、捐发蚕桑秧苗、加强相关宣传教育等措施,以推动当地蚕桑业进步的事实^{[9] [P.403]},充分体现了该县推行种桑养蚕技术的近代化经济管理手法和特色,这从又一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南乡土志近代化内容之丰富。

文化教育是该时期本区乡土志所载当时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又一重要内容,而新的办学形式、教育观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等的记载所占比例相当大,其突出表现为大多数乡土志在教育部分都有“学堂”一目,并以各种方式录入各类学堂的名称、位置、学生人数等基本情况,表明各地学制改革的成效。如《新宁县乡土志》“第八类实业”的“第一款:土之实业”谈到“本境土类分旧学、新学两派……新学派约四百余人,以科学为宗旨,或入初级小学,或入高等小学,或赴郡赴省从师,率皆讲求时务,蒸蒸然一文明进化之机也。”^{[34] [P.309]}《宣威州乡土地理》第十一课“学堂”云“城内有初等小学堂二堂,高等小学初级、师范各一堂,皆就榕城书院改设,而益以考棚等处为校舍,规模尚觉雄壮。”^{[35] [地理卷·第十一课]}并附有“宣威州治学堂全图”,均较为翔实地反映了当时本区办学形式的变化情况。

另,当时本区至少有60%的乡土志反映了教育观念的近代化更新。如《灌县乡土志》序言批判

中国传统教育“读经不求之实践,阅史不征诸实用”^[10]《序言》的不良现象,《双流县乡土志》的“双流之实业”指出旧学有“用非所学、学非所用之弊”^[36]。既然旧学弊端重重,《大邑县乡土志》就提出“殆我中国讲求实学之权兴欤”^[9]《P.346》。而《巫山县乡土志》则提倡“变古校为今校,本旧学为新学,革新以振兴学校,为普通学以培植人才。”^[12]《例言》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势演变,国人的教育观念已明显变化。1949年陈宗棠所撰《四川乡土常识》“弁言”开篇即云“智能培育,重在实用”^[33]《弁言》,可见当时本区乡土志非常关注实学观念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深刻影响。

如《乐至县乡土志》有一与众不同的内容——“小学教授法”,该法表明:1. 小学课程分地理、历史、理科等“实质”科和数学、语言等“形式”科。由此可知,清末实行的新教育讲究“实学”,说明其教学方法应有别于传统儒家的教学方法;2. “实质”科采用的是“实质”教授法,即直观教授法;3. 地理、历史、理科等“实质”学科的教学方法应该摒弃之乎者也的死记背诵、空谈理性的高论阔论,而强调实行由近及远的教学原则,这是实行西方教育家所提倡的、符合儿童心理特点的直观教学法。^[14]《P.1-4》《大邑县乡土志·序言》云“夫理莫切于浅近,物必始于细微,积点而成线,积线而成面,积面而成体,胥是道也”^[9]《P.346》,精辟概述了由近及远、积少成多地积累儿童乡土知识的直观教学法。反映当时小学新教学方法的乡土志还有《新平县乡土志合编》^[37]、《禄劝县乡土志合编》^[38]、《元谋县乡土志》^[39]等,均从教育的角度体现了当时本区乡土志学习先进国家教育文化、追赶世界发展进程的浓郁时代特色。

再如生活习俗。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交流越发频繁,中国传统的生活习俗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元素,形成较多中西合璧的新习俗,这些均在当时本区乡土志中有所体现。如《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第九章“社会习尚”记“本县各机关一致改用阳历”。作者说明了阳历的特点、运用方法,在比较了阳历和阴历的异同后认为,阳历“对于国际方面、民生方面以及国家预算等事项,均有莫大之效用”^[40]《第九章第二节》。《楚雄县乡土志》“卷中”第三十九课曰“今士兴学堂,农务蚕桑,女学织机,工成良技,商勤贸迁,而纸火道场渐就消灭,庶几自强有基矣。”^[41]《P.1351》《牟定县土地志初稿》第三十九课“风俗”中记载了一条有关解除缠足陋俗的信息:缠足绝大弊俗,半多主于妇人,女学之不兴,此风难绝矣。^[18]《P.26》《路南州乡土

志》“商务”载“蒙自运入之洋缎、洋绸,岁三百匹。”^[42]《元谋县乡土志》“商务”记“境外运入货物则以布帛、盐为大宗……洋烟则由姚州运入”^[39]《商务》。《新纂县乡土志》“洋广杂货”云:洋缎、洋布、洋靴、钟表、烟灯、烟盘等物,“民间随时购诸省城,约计共二万余金之数”^[43]《P.51》。无论是对使用西方阳历的大力提倡,通过“兴学堂”等措施消灭“纸火道场”等旧风俗,还是倡导通过兴办“女学”等方法改变妇女缠足之陋习,以及国人对外来“洋货”的广泛使用等成为当时本区乡土志记载的重要内容。

四、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浓郁

近代是一个西学东渐的特殊时代,当时地理、历史、国文、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教育饱含注重实地调查、讲求实学的务实之风。而作为乡土教育的教材,乡土志也受此风的深刻影响,因此,当时本区的乡土志从“序言”、“凡例”或“跋”到各项具体内容的编写都融入了求真务实的科学思想。如绍曾所撰《大邑县乡土志》序言开篇即慨叹“呜呼三代而下,学术之日流于伪也。”继而回顾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认为时代变迁应“求为有用之学”,于是号召“方今泰东西各国崇尚实学……以抒其爱国之热忱,所以国势愈强而学术蒸蒸日上。我支那为文明最古之国,相形见绌,瞠乎其后,然后叹实学之不可不讲也。”^[9]《P.346》绍曾是一个思维开阔、观念先进的地方官员,他看到当时中国学术、教育的落后状况,也敏锐洞悉西方各国能够“蒸蒸日上”是因为“崇尚实学”,故而发出“实学之不可不讲”的号召。《安岳县乡土志》“凡例”有两条内容,一是“物产、商务为类,至贻销路甚广,兹仅就调查所得及各地报告计之,其中错谬之处,不知几许,心虽不安,然亦无可如何也。”二是“山水地理道路皆康映奎所亲历,游艺圃亦分道测量,跋涉之艰,莫能名况,瘁特为标出,以誌勤劳。”^[44]《P.3-4》前一条凡例表明作者处理物产、商务这类内容时的依据是“调查所得”和各地呈上的报告,且没有做任何更改,即使有“错谬之处”的担忧,但总比无凭无据胡乱编写更为求真务实。后一条凡例说明此乡土志的山水地理道路等部分信息是调查者康映奎亲自考察所得,考察过程十分艰辛,难以言表,更透露出此乡土志的调查者和编撰者注重调查的求实作风。

乡土志为实现晚清政府提倡“新学”的改革目的,所编内容、特别是作者所处时段而发生的事情都要求据实调查,不能只依赖于旧志旧史,故当时

本区大多数乡土志都会把调查所得的各项信息编入其中。如《册亨县乡土志略》第七章“教育”所载内容丰富,既有《册亨县学校调查表》^{[28] (第七章第一节)}呈现该县各学校的名称、校长姓名、教员人数、学生数、设备情形、经费概况等信息;又有《贵州省册亨县各区私塾及教会学校一览表》^{[28] (第七章第二节)},展示该县私塾的塾师姓名、塾师学历、地址、学生数、全年所收学费、书籍等情况和教会学校的地址、学生数、收费等情况。前者名为“调查表”,可推断其中的信息应为调查所得;后者虽名称中无“调查”二字,但因所编私塾内容详细,而所示教会学校为近代新兴学校,旧志中不会有相关记载,无法转载引用,据此推测此表信息也应为调查所得。该乡土志作者通过切实调查而获得该县各学校的信息和数据,不是引用旧志,或者凭空捏造而成。又如当时贵州省编成的乡土志虽为数不多,但因战争内迁至贵州的高校、文人给该地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故而当时贵州省乡土志都非常注重实地考察,编撰内容大量引用调查资料,甚至编写而成的乡土志书名直接以调查报告命名。如《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29]、《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40]等,总体质量较高。在这些乡土志中,处处可见考察调研所得的信息,如《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第一章“地理”中的第五点“气候”记载的该县的年平均温度、年最高和最低温度、降雨季、霜期等都是经过“可靠之测验”而得^{[40] (第一章)},足见该乡土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定番县乡土调查报告》中各类调查数据表格多达96个,而诸如男女鞋式、长衫、短装、头巾、女子缠足、苗族服饰等插图达53幅^[29],虽然其数据不一定全部准确可靠,插图不一定非常精美^①,但能够充分证实编撰者调查的内容全面丰富、调查的工作踏实到位。当然,云南、四川和重庆也同样受此风影响,在其乡土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上述表明,当时这种求真务实之风不仅提升了本区乡土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开创了近代教科书编写的新模式,更充分彰显了当时本区乡土志注重实地调查、讲究实学的浓郁务实之风。

五、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战时危机感强烈

近代外敌不断入侵,特别是抗日战争,令中华民族时刻持有强烈的战争危机感,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期望通过各种方式凝聚民族精神,团结一切力量御敌抗战。正如《石阡乡土教材辑要》的

作者杨大恩作“自序”时所呼吁“矧值抗建时期,为持久抗战计,在教育方面,宜注重历史、地理、人物志,及民族先烈事迹,以期提高民族意识,增强抗战力量,则乡土教材又有积极提倡之必要!”^{[30] (序)}正所谓抗战应以“提高民族意识、增强抗战力量”为根本,人人都应为国出资出力,甚至捐躯。这在当时本区其他乡土志中论述颇多。如鸦片会导致吸食者身体败坏、精神萎靡不振,禁烟成为抗战御敌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在民国时期乡土志中反映尤为突出。如《定番县乡土教材报告》对禁止鸦片种植和吸食的记载就较为详备,其第九章“政治”的第九条“禁烟工作”,便对定番县的鸦片种植情况、吸食鸦片的人数及国民政府的禁烟措施等情况进行了总体介绍,其原文提供了四个信息:第一,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制定了有关禁种鸦片的具体法令,严格执法、惩治种烟违法者,必有较大的震慑威力;第二,定番县府制定了禁种鸦片的积极措施,如将种烟地亩改种粮食或经济作物等;第三,定番县政府加强禁种的监管,即随时派人员巡查等;第四,禁烟工作成效良好,经过各项法令、措施的实行,大多数地区已经禁种烟苗,只存在“在五、六两区边徼地带,交通困难,县府从未有人履勘,故该两区人民,仍有不少偷种者”的情况^[29]。由此足见当时定番县禁烟的广度之大和力度之深、成效之明显。通过禁烟,到1940年西南三省的鸦片泛滥得到一定的遏制,禁烟收到相当效果,特别在城市和交通较发达地区更是如此。^②当然,后来由于多种原因西南地区又开放禁烟则另当别论^③。该时期贵州省记载禁烟相关情况的乡土志还有《贵阳乡土地理》^[26]、《榕江县乡土教材》^[27]、《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40]等,足以体现民国时期贵州乡土志非常注重记载禁烟运动的相关情况。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清代本区乡土志更关注鸦片的种植和销售问题,反映晚清时期鸦片种植和贸易的合法化。如《新津县乡土志》在“物产”部分提及有鸦片的种植情况“山地多植红白苕及地梨、鸦片,木多樅树。”^{[1] (P.48)}而《江津县乡土志》对该县鸦片烟的销售情况记有一条“一日鸦片烟,江津出产除出境外,本境销行每岁约计千余担(每担百斛)。”^{[21] (P.107)}清末本区乡土志关注鸦片的种植和贸易问题,而民国时期本区乡土志则更注重禁烟问题,鸦片由清末合法化到民国非法化的转变正好体现了全民“凝聚民族精神、御敌抗战”这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为了应对战争带来的疫情严重、物质匮乏等

问题 慈善运动也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的重要方面,当时本区乡土志此项内容的记载也非常丰富。如《册亨县乡土志略》第六章第二节“义仓”,简明扼要地呈现了该县义仓的数量、分布、存谷量等情况^[28]〔第六章第二节〕。又如《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第九章“救济工作”所提到的县立救济院、战地儿童保育院等机构是政府组建的慈善机构,且发挥了一定的救济作用^[29]〔第九章〕。再如《平彝县地志资料表册》专列“各卫生慈善局所名称所在地及办法”一目^[20]〔十八〕,说明卫生慈善局在当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关注鸦片种植、贸易的记载到“禁烟”记载的大量出现,从县级义仓的数量、存粮量、分布等的详叙到对“救济院”、“战地儿童保育院”、“卫生慈善局”等慈善机构作用发挥的记述,无一不是当时本区乡土志凝聚民族精神,团结民众御敌抗战时代特色的具体反映。

注释:

①张新民先生认为《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由于时间仓促,涉及面过于宽广,多数资料仍未经最后核实,错讹遗漏之处颇多,描述深度亦嫌不够。”(张新民《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贵州地方志修纂源流考证》,《贵州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

②黎虹认为西南地区由于政府官员和地方军阀的知法犯法等原因,最终导致本区开放禁烟。(黎虹《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 [1] 禄勋. 新津县乡土志 [Z]. 宣统元年铅印本, 1909.
- [2] 张景旭修, 齐肇璜纂. 丹棱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 1905.
- [3] 王道履. 南部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4] 李埏. 路南县乡土志辑要 [Z]. 民国二十八年抄本, 1939.
- [5] 徐原烈. 彭山县乡土志教科书·编辑大意 [M]. 民国十年油印本, 1921.
- [6] 段鹏瑞. 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 [Z]. 宣统三年刻本, 1911.
- [7] 佚名. 路南县乡土志草本 [Z]. 民国二年抄本, 1913.
- [8] 游夔一. 中江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9] 绍曾修, 查体仁纂. 大邑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10] 钟文虎修, 徐昱, 高履和纂. 灌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三年刻本, 1907.
- [11] 叶文光. 新都韵言 [Z]. 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 1932.
- [12] 周宪斌. 巫山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1906.
- [13] 寸开泰. 腾越乡土志·卷八“商务” [Z]. 清末抄本.
- [14] 刘达德. 乐至县乡土志 [Z]. 民国元年抄本, 1912.
- [15] 杨子元. 蒲江乡土历史读本·编辑宗旨 [Z]. 民国五年铅印本, 1916.
- [16] 彭松森. 元江乡土韵言·序 [Z]. 民国九年刻本, 1920.
- [17] 刘肇烈. 金堂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18] 吴联珠. 牟定乡土地理志初稿 [Z].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据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抄本传抄度藏.
- [19] 李聪. 云县乡土教材 [Z]. 民国三十五年铅印本, 1946.
- [20] 佚名. 平彝县地志资料表册 [Z]. 昆明: 云南省图书馆, 据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抄本传抄度藏.
- [21] 佚名. 江津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22] 佚名. 晋宁州乡土志·地理卷 [Z]. 清宣统元年稿本, 1909.
- [23] 佚名. 江北厅乡土志 [Z]. 1950年传抄本.
- [24] 周国华. 册亨县乡土志略 [Z]. 民国二十五年版, 1936.
- [25] 赵树人. 昆明县地志资料 [Z]. 民国十年铅印本, 1921.
- [26] 文宗潞, 绍曾. 贵阳乡土地理 [Z]. 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1931.
- [27] 李绍良. 榕江县乡土教材 [Z]. 民国三十二年油印复制本, 1943.
- [28] 罗骏超. 册亨县乡土志略 [Z]. 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1936.
- [29] 吴泽霖等. 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 [Z]. 民国二十八年稿本, 1939.
- [30] 杨大恩. 石阡乡土教材辑要 [Z]. 民国三十一年成启宇抄本, 1942.
- [31] 马太元. 滇志韻语 [Z]. 民国三十六年石印本, 1947.
- [32] 田明理等修, 黄尚毅纂. 绵竹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1908.
- [33] 陈宗棠. 四川乡土常识 [Z]. 民国三十八年石印本, 1949.
- [34] 佚名. 新宁县乡土志 [A] // 姚乐野, 王晓波主编. 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 [Z].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 [35] 缪果章. 宣威州乡土志 [Z]. 清宣统间铅印本.
- [36] 佚名. 双流县乡土志·双流之实业 [Z]. 清末抄本.
- [37] 马太元. 新平县乡土志合编 [Z]. 宣统三年铅印本, 1911.
- [38] 鲁大宗. 禄劝县乡土志合编 [Z]. 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1908.
- [39] 周汝元, 魏家斌等纂修. 元谋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年草稿本, 1904.
- [40] 张少微. 惠水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 [Z]. 民国三十六年铅印本, 1947.
- [41] 佚名. 楚雄县乡土志 [A] // 杨成彪主编. 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楚雄卷下 [Z].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42] 佚名. 路南州乡土志(第九编) [Z]. 清末抄本.
- [43] 余慎修, 陈彦升纂. 新繁县乡土志 [Z]. 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1907.
- [44] 黎虹. 鸦片与民国时期的西南社会 [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12).

收稿日期: 2013-11-02 责任编辑 杨春蓉